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0.03.009

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治理的健康风险研究 ——基于空间视角^{*}

梁海祥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 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得健康再次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议题。健康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对于个人的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对于政策实施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 城市的健康风险与空间紧密联系。本文使用上海市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抽样数据, 以分析上海人口分布与社区环境暴露风险为例, 探讨空间视角在社会学健康研究中的运用。数据结果显示, 外来常住人口聚集区与社区环境风险暴露区高度重合。可见, 面对新技术与新发展时,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发现机制才是最关键的举措。在社会科学的空间维度下研究健康风险, 有利于化解和防范风险, 并降低健康不平等。

关键词: 城镇化; 健康风险; 空间视角; 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72(2020)03-0102-10

城市发展史是与疾病相伴的历史。14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肆虐欧洲, 夺取了数千万生命。19世纪在美国面对黄热病爆发时,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友人的信中就提到“大城市就是道德、健康和人类自由的瘟神”。^①之后伴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系统并没有合理配置。这就造成了在工业化前期, 城市中住房拥挤、生活用水不洁净、空气污染等都滋生着疾病风险, 城市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善卫生条件。城市的改造和技术的进步使得城市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提升, 城市成为人类居住的理想空间, 城市化进程也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2019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 ^②意味着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6人生活在城镇。但随着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多次发生, 在城市中的疾病预防和健康风险再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中国的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持续增加, 并且已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 民众健康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从一些健康指标上看中国的健康状况可以和西方国家相媲美, 如中国人均寿命由67岁增加到73岁。^③除了人均预期寿命,

^{*}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超大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以上海为例”(项目编号: 2018ESH004)、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 18PJC089)和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院内招标课题共同资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SUNS)。SUNS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Ⅲ类高峰计划资助, 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负责执行。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和项目组参与人员的贡献。

① [美]约翰·J·马休尼斯, 文森特·N·帕里罗. 城市社会学: 城市与城市生活[M]. 姚伟, 王佳,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② 李培林. 社会蓝皮书: 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③ World Bank,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2013.

中国的医疗健康状况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①同时随着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提高,数据也反映了中国健康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但是与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相比,健康卫生事业方面的进展却显得较为滞后,甚至有健康指标出现倒退的趋势,如婴儿死亡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甚至出现上升。^②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从城市的一个地区到全城,从一个特大城市扩展到全国,从一个国家到其他国家,从而成为了影响全球的疫情。这当中,空间的转移与传播是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关注空间视角,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控制和预防提供支持。

一、健康是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反复强调健康的重要性,“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中国政府也一直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些都体现出了健康的重要地位。

首先,健康是最重要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③个体的所有活动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失去健康将限制其他能力的发挥。如果健康受到损害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替代,因为健康受损对于个体来说是从最底部根本性打击,它将摧毁了其他各项活动的自由和选择,“享受长寿以及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好生活的可行能力,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珍惜和向往的”。^④

其次,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健康是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可以创造财富,因此健康及健康不平等受到经济学家们强烈关注。从政策角度出发,减少居民的健康不平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⑤因此,个体和社会层面都将健康看作是重要的财富,不好的健康状态会带来巨大的个体和社会经济负效应。从家庭角度看,健康水平差则会导致个体的疾病负担、劳动力削弱、就业机会少、工资水平低以及健康投资弱等来影响家庭收入,这将导致一个“健康贫困”的恶性循环。^⑥Mushkin认为健康和教育两者都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⑦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看,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将受到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从而对基础建设与投资、消费都产生抑制作用。

另外,健康研究有利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健康投资、卫生服务对于健康都有着

① 刘慧侠.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健康不平等研究[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② 邓曲恒. 中国城镇地区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5):62-68.

③ 可行能力概念来自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指个体可能实现的、各种功能性的组合。详细内容参见:[印度]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④ 刘民权, 顾昕, 王曲. 健康的价值与健康不平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Amartya Sen, “Why Health Equity?”, *Health Economics*, 2002, 11(8):659-666.

⑤ 田艳芳. 健康对中国经济不平等的影响[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⑥ 刘慧侠.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健康不平等研究[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⑦ S. J. Mushkin, “Health as an Invest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129-157.

重要作用，都是旨在消除不平等。在促进社会团体的公共政策中都应优先考虑健康公平。^①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取得重大成功，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是趋利的，在非市场设施方面仍需要公共行动。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有利于减少贫困，对于健康不良等能力剥夺的研究抓住了贫困根本。而且实践证明投资健康比投资生产部门能更快地得到回报，并且可以用较少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对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能够使得政策制定者优化对国民健康的投资，进而促进政策的合理性，获得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健康是最重要的可行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减少贫困与不平等。对此有了充分认知，才可以意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个体、社会 and 国家的损害。

二、城市健康风险的空间维度

（一）城市空间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从历史上看，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密切相关。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称《条例》）中有详细的说明。《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在工业化前期，即城市发展初期，城市内部的卫生条件十分糟糕，因此也造成当时欧洲霍乱和鼠疫经常发生。然而由于科学知识的有限，人们并不知道疾病真正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历史上在公共卫生与城市空间相联系的案例中，最经典的就是对于霍乱和水源地的研究与分析。1854年，约翰·斯诺医生利用伦敦霍乱死者空间分布，推测出水源与霍乱相关联，从而推翻了之前普遍认为的“迷雾”传播，他的研究也开启了现代流行病学和对空间的重视。

在中国与饮用水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时有发生，有学者分析了中国1996年至2006年中国饮用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现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混合污染案例都导致了中毒和死亡的事件。^②另外，学者利用2002至2011年中国肺结核发病数据的分析，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空间特性和聚集特点，结果发现全国肺结核的发生存在空间聚集性，在新疆、贵州、广西存在空间聚集。^③从鼠疫到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大多数传染病都与恶劣的环境、密集的人员活动密切相关，因为这些为疾病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因此，城市作为一个人员密集、流动频繁的区域，极易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地、传播地和主战场。

（二）健康研究的社会因素

关于健康的研究最初是属于医学的研究领域，因为医学是致力于治疗疾病，保持

① Amartya Sen, "Why Health Equity?", *Health Economics*, 2002, 11(8):659-666.

② 王强, 赵月朝, 屈卫东, 等. 1996—2006年我国饮用水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析[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10(4): 328-331.

③ 山珂, 徐凌忠, 盖若琰, 等. 中国2002—2011年肺结核流行状况GIS空间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4(4): 388-391.

人身体的健康。但随着传统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被控制住,慢性病成为了主要的病症,而这些疾病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健康不平等随之被关注。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ies, Health Disparities)并不是指所有的健康差异,主要是指社会群体中因系统性差异导致的健康水平不同,例如弱势群体(如穷人、女性、少数族裔等群体)与其他相比,可能遭遇更多的健康风险和产生疾病的社会不平等现象。^①

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也是从医学开始,发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它是一个从医学化到去医学化的过程,健康不平等研究逐步关注非医学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主张去医学化的研究者认为,健康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健康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问题,通过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善整个群体间的健康差异,^②因此健康问题也进入到了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医学社会学、流行病学、健康人口学都是在医学基础上发展出来,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的疾病产生机制。经济学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关注健康的投资与回报,公共卫生则更多关注医疗资源的分配和政策的制定。

健康是一种社会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消费品。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追求健康除了基于生物医学的需求之外,也是一种社会需求。社会流行病学、社会学等学科分别从不同维度研究了族群、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社会支持、居住状况、邻里社区、区域位置、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解释健康不平等。^③20世纪中期社会学者开始关注健康的决定因素,探索贫困与健康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是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原因及其影响。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美国医学社会学逐步向健康社会学转变,医学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医生及医疗服务整个系统,延伸至所有与健康相关的领域。^④20世纪80年代健康不平等作为一项新兴学术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下,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不平等的持续拉大,人们对于健康的诉求愈发强烈。因此健康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及运行机制,受到学者们的长期与广泛关注,国内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三) 空间视角下的健康

社会科学对于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们,包括伯吉斯、哈里斯、霍伊特、帕克等及其学生们关注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城市。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研究中,由于竞争资源区域间和部门间都会产生形态上的差异性。^⑤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空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

① Paula Braveman, "Health Disparities and Health Equity: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06, 27(1):167-194.

② 梁君林. 西方健康社会学研究的发展[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6):93-99.

③ Eero Lahelma, "Health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W. C. Cockerham. Wiley: Blackwell, 2010.

④ 冯显威. 医学社会学的演变与健康社会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J]. 医学与社会, 2010(7):7-10.

⑤ [美]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张茂元,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泛关注, 在健康研究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空间的作用, 郑震在《空间: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一文中谈到了社会学中空间理论的发展。^①在新的技术条件下, 研究者可以运用空间视角对于居住隔离、人口迁移、疾病传播等研究。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空间社会科学结构中心主任约翰·罗根 (John R. Logan) 对空间研究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综述, 其中对于空间研究的关键概念、测量方法、分析工具都进行了介绍。^②

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关注空间与健康的关系, 但更多的是从医学角度分析, 对于社会因素、群体差异的关注都很少, 因此需要社会科学的学科介入。社会学关注城市空间中来自底层、边缘的声音, 如城市中弱势群体状况, 城市贫困与贫民窟、少数民族裔的居住隔离、城市中犯罪等的空间分布等。本文的后半部分将从社会学关注的群体特征入手, 从社会不平等方面探究外来常住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环境的空间分布, 进而探讨城市健康议题。

三、实例: 居住分异、社区环境与健康风险

空间分析的方法和形式有很多种, 包括作图、测量距离、空间分析模型等, 但作图是基础和重要的方法。作图是对于数据的空间可视化操作, 地图的优点在于可以清晰显示很多层面的信息, 并且可以显示出很多无法在文字信息和表格中显现的信息。简单的地图就可以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来分析, 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空间集群和离散分析上, 并提供方法来消除空间随机变化, 更清楚分析非随机模式。^③分析者需要使用探索性的分析方法建立图层间的关联, 这样可以显现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新发现。

社区环境是与个体的健康密切相关, 噪音、空气、水源等环境污染会直接侵害个人的健康, 若不加控制与调整, 将影响到整个公共群体的健康。因此我们将建立在空间作图基础上, 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复制性和提升性的分析研究, 研究外来群体和环境风险暴露分布情况。流动人口比本地居民承受了更多的社会压力和排斥, 在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处于弱势, 因而面临着更大的健康风险。王桂新等就使用上海数据研究了外来人口较差的居住条件对其健康的影响。^④因此提出研究问题是外来人口在空间分布上是否呈现更多的健康危害, 以此为例来展示城市健康研究的空间视角。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呈现的是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布状况和居住地区环境风险分布状况两方面可视化结果, 目前并没有包含两者变量的数据库, 因此使用了两个数据库。其中, 对于外来人口分布状况的研究使用的是人口普查数据, 普查数据的特点是能够呈现出总

① 郑震. 空间: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 社会学研究, 2010(5):167-191.

② J. R. Logan, "Making a Place for Space: Spatial Thinking in Social Science", *Annu Rev Sociol*, 2012, 38(1):507-524.

③ L. Anselin, Y. W. Kim, and I. Syabri, "Web-Based Analytical Tool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Spatial Dat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004, 6(2):197-218.

④ 王桂新, 苏晓馨, 文鸣. 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对其健康影响之考察——以上海为例[J]. 人口研究, 2011(2):60-72.

体的真实状况。本文使用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上海村/居委层面数据,该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在 2010 年11月1日零时采集,普查对象为普查标准时间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其中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包括在上海市所调查的230个街道(镇),5432个村/居委会,其中10%为抽样数据。^①

对于社区环境风险特征分布的研究使用的是抽样数据,因为人口普查数据中并没有社区环境特征的变量。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该调查项目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732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2017年完成。^②本文只涉及到社区层面的数据,共有537个社区层面的数据。

(二) 变量操作

为了考察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分布的情况,研究使用了分异指数 D_i 。研究上海居住群体分布的“均质性”,采用了改进的局部分异指数。分异指数的概念则是表示不同群体间的分布是否呈现一致性,即如果某个群体在当地社区的分布高于这个群体在整个城市的总体分布,那么则认为在当地的分布过高。本文中,分异指数越高则说明外来常住人口在此地聚集程度越高,具体的分析方法可参见笔者相关研究。^③

对于社区环境风险特征的测量沿用之前学者的变量操作,^④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第一期数据中的社区环境情况作为环境暴露指数。具体包括9个是否的问题,涉及到社区异味、垃圾桶渗滤液、污水排放、大气污染源、油烟、烧烤摊烟气、交通噪声污染、工业噪声源、社会噪声源和广场舞噪声。生成9个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把9项相加形成一个0到9的数值,分数越高说明所在社区环境越差,代表在空气、水源、噪音等方面较差。

(三) 实证分析结果

目前对于空间分析有许多软件,在本文中使用的ArcGIS10.0版本的软件进行空间分析,对于外来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异情况使用的是空间插值法,每个点是所在社区的分异指数,为的是呈现数据的变化趋势;对于社区环境风险使用的就是将环境指标赋值到所在区块上(区块代表的是街道)。经过数据的处理,在属性数据的基础上叠加空间数据,形成ArcGIS软件可分析的数据格式,最后呈现出图1和图2的结果。

① 参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工作细则》,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html/fu10.htm>.

② 吴晓刚. 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1-08(6).

③ 梁海祥. 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居住隔离——以上海市居住分异实证研究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2015(8):79-86.

④ 孙秀林,施润华. 社区差异与环境正义——基于上海市社区调查的研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8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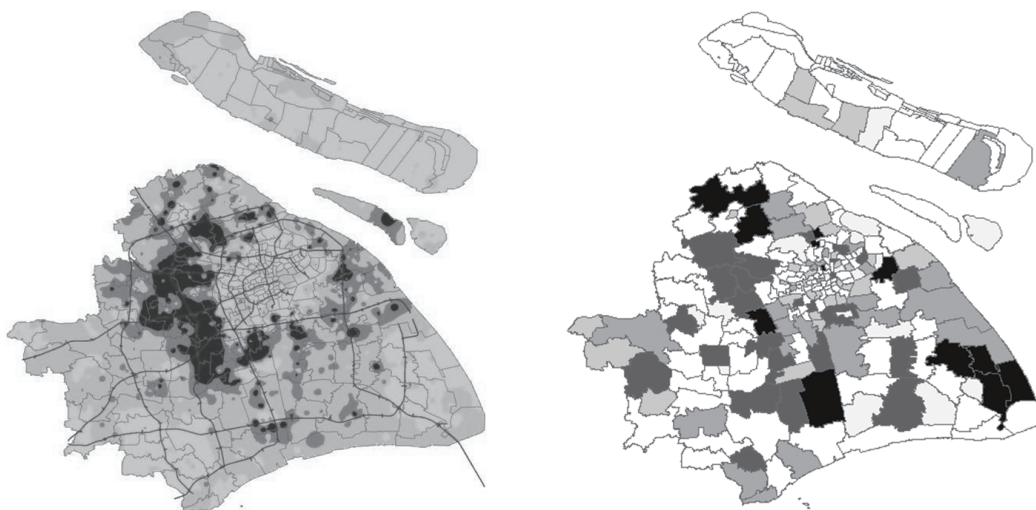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分异指数图 图2 上海社区环境风险分布图(街道层面)

图1所展示的是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分异指数的插值图,图层的底图是上海行政区划图,颜色由浅(白)到深(黑)表示的是分异指数由低到高,颜色越深代表着外来常住人口在本地的人数越高于全市平均状况,即外来常住人口比其他地方更加聚集。作图的优点能得到充分显示,可以清晰的从图上发现趋势,上海外来常住人口聚集分布呈现相关性和邻近性。具体来看,外来人口的分布多集中于上海外环外地区,在图上这部分颜色更深并且相连接,尤其是西面的嘉定区、青浦区、松江区、闵行区等。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论证这是与上海的工业布局密切相关,而且这些产业多需要人员密集的分布。^①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在全市分布的状况,可以得出上海呈现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分异,并且在总体呈现聚集和相邻。

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中的社区环境数据,分析得出图2的结果。在上海行政区划图上区块代表着不同街道,而颜色的深浅则代表着街道内样本社区的社区环境状况,颜色越深则代表社区环境状况越糟糕。本研究中的上海街道层面的社区环境状况,比之前研究差异的地方在于分析尺度更小,之前研究使用的是区县层面的分布。使用更小尺度的分析单位优点在于可以分析区县内部的环境风险差异,微观尺度能够比宏观尺度获得更多信息和显示区县内部的差异。同时缺点在于会因为数据获得性原因产生缺失,因为使用的是抽样调查数据,有些街道并没有收集数据,因此图上白色板块代表的是没有数据的街道分布。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街道层面社区环境指数的分布状况发现规律,城区内的社区环境优于郊区,外环内外差异明显。图2显示,在上海市城区西面,嘉定区、松江区、闵行区的几个街道的社区风险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在图1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居住分异图和图2上海市社区环境质量分布图基础上,可以分析居住社区与社区环境的关系。分析使用空间分析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分析单一指标的分布趋势和具体地点,还可以对图层进行叠加比较分析。有学者已经使用

① 梁海祥. 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居住隔离——以上海市居住分异实证研究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8):79-86.

回归分析的方法论证外来人口与社区环境在数据上的显著性,即外来人口比本地群体更容易受到社区环境的危害。^①空间分析则可以更加直观发现两者的关联,并且可以知道哪些区域的影响更加大。将图1和图2进行比对,可清晰地看出非上海户籍人口聚集地环境暴露指数更高,更容易受到环境暴露的风险,这些区域分布在上海主城区的西面部分,而这些是与上海工业基地的布局密切关联。因此这样的分析可以明确地供决策者、分析者,改变相关的社区环境状况和相关的政策,从而也有利于群体健康和整个城市的健康。以上只是利用十分简单的描述性分析方法,还有更多的空间分析模型和手段可简要展示社会空间如何在社会学健康研究领域运用。

四、空间视角下城市健康风险的思考

空间概念研究在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地理学等学科被广泛运用,但是对于国内的社会学专业,尤其健康领域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多面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社会学关注的是群体特征和社会因素,如职业、隔离、贫困等相关因素。社会学有空间研究的传统,尤其在新背景下社会学在健康研究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展,以提供更多有利的政策支持。因此,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治理的健康风险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 健康风险治理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新科技和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新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的出现,会给健康治理和空间研究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具体可以从传染性疾病三个主要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进行分析。

在传染源与易感人群方面,发现传染源和保护易感人群,才可降低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对于公共卫生事件来说,预防才是最关键的,这需要收集各种与健康事件相关的数据并进行监测,这样才能高效预警识别公共卫生事件发生。^②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空间信息,需要科学地加以使用并对空间趋势和严重状况加以分析,这样才有利于降低整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例如对传染源的社会属性进行分析,对易感人群分布地进行高度戒备等。这就需要从本文所提到的空间视角,以及社会学视野下群体特征的空间视角去进一步研究。

在传播途径方面,交通的发展使得时空概念发生转变,控制传播变得更加困难。时空在以往是分割的,疾病传播交流可能是百年甚至千年,例如在蒙古大军驰骋亚洲欧洲时,东西方的传染病疫情得到了交融;在欧洲航海家发现新大陆后,印第安人被欧洲人带去的病毒毒害。而如今新交通工具的出现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以上海到北京为例,乘坐特快列车需要14个小时,乘坐京沪高铁只需5个小时,乘坐飞机不到2小时。地理学家贾内尔称之为“时空收敛”,以不同地点之间移动需要的时间来表示距离的“收缩”。新技术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地球村的概念逐渐被人所接受。在一

① 孙秀林,施润华.社区差异与环境正义——基于上海市社区调查的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86-93.

② 赞静,任赞静,黄建始,等.症状监测及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1):56-58.

些商务人士看来,世界只是变成了在几个城市中的穿梭,人们就在交通工具的管道中流动,周边的其他事物都被忽略。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健康领域,尤其对于传染性疾病而言,时空的收敛会带来更多的挑战。疾病会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世界无障碍地传播,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发展是与现代化交通发展密切相联系的,时空发生了收缩,同时也没有了原始自然屏障对于疾病的阻隔。及早地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分析传播路径都需要空间维度的参与。

(二) 健康城市建设需要空间维度支持

早在20世纪80年代健康城市就被提了出来,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城市需要发掘社区资源,改善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居民能发挥自身的潜能。中国的“健康中国”战略,以及地方的诸如“健康上海2030”规划等,也都开始关注城市健康。在健康城市建设中,新的分析工具的出现为空间分析实证研究提供了平台,为数据收集及分析提供了支持。

数据收集方面,现实生活中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持GPS和可以定位坐标的电子产品的出现,以及网格化大数据治理的实施,让收集人们的空间变动信息成为可能和简单。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时段的数据收集,可以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的运动轨迹。数据分析方面,利用ArcGIS、R等数据可视化软件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联系,可以展开很多空间上的文化和犯罪等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空间理论的运用及其发展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使用手机信号数据、行程数据、购买记录等海量的数据都可以追溯、预测事件的发展。

(三) 城市治理需关注城市的空间正义

城镇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城镇化背景下健康风险在管控中也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地减少健康不平等。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分配、利用等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会发现群体利益的受损,正如上文空间分析实例所展示的,外来人口聚集地社区环境相对更差,进而可能对健康产生危害。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极化和居住隔离,这也会带来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因此公共资源的获得会存在受益群体差异,不利于特定群体的健康。

同时,健康的内涵并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也不只是卫生和医疗,还包括心理健康等,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也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对于个体不仅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和重要的可行能力,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城市健康风险的治理不只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需要尽量减少和降低特定群体的健康风险暴露和健康损害,注重公共服务的均衡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众多研究中,空间维度在健康风险研究中将发挥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案支持。

【作者简介】梁海祥: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都市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健康不平等。

Health Risk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Urbanization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LIANG Hai-xi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mak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health. Spatial analysis of urban health risk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The research firs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which is embodied in feasible ability, human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health risk and sp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urban spac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space. Third, use the 2010 census data of Shanghai and the sampling data of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hanghai immigrants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exposure risk,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analysis in sociological health research. Finally, in the fa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he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mechanism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the most critical measure.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social science is helpfu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ization; health risk; spatial analysis; public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马莹)

(上接第101页)

最后,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文化产业的冲突,本质上仍然是文化本身的冲突。因此,推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国际化固然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但这一过程中同样要尊重他国的文化主权。例如,文化企业的海外投资同样应当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扶持当地传统文化,尊重当地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等等。安全问题不是零和游戏,文化安全尤为如此。只有在国家间达成了关于文化安全的相互共识与彼此尊重,才能从政治上减少冲突的发生。

【作者简介】赵海乐: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The Approach of Cultural Sector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from a Soft Power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Canada's Practice

ZHAO Hai-le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one of the three resources of soft power. Therefore,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s one essential aspect of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important advocate of Cultural Security, Canada emphasizes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could bring net benefit to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is willing to exchange entrance for investors' promis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ocal culture. The focus upon local culture help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a's dome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onsequently heightens the social coherence. Meanwhile, these measures could not eradicate the threat posed by foreign cultures. While it is advisable for China to emulate Canada's meticulously drafted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standar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utiously enter into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order to avoid prospective conflicts with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

Keywords: soft power; cultural security;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net benefit; cultural exception

(责任编辑: 黄志瑾)